

低人权优势的化 解之法——与秦晖 先生商榷

摘要：正如秦晖在其新书《拯救德先生》中所充分论证的，片面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反而为昂纳克寓言的应验提供了必要条件。今天，高人权国家已终止单维经济全球化，却未重拾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政策，而是转向关税。秦晖认为关税并非万能，对其推进民主的前景颇为悲观。作者认为若关税能针对低人权实体因偏离市场经济体制所造成的价格扭曲，则这种关税的征收不仅将更加师出有名，而且有助于市场制度的发育和完善，因而有利于人权的改善、民主的推进。

秦晖在其《拯救德先生：直面第三波民主潮的逆转》（上下两卷，下称《秦书》）中，发聩震聋地提出：“目前第三波民主¹遇到的危机，说到底与‘全球化中的低人权优势’有关”。秦晖为此发出救救德先生的呼吁。对所有支持民主事业的人们来说，在深感无奈的同时，也激起更大的动力，对民主化不进反退的深层原因及其拯救之道一探究竟。

秦晖多年来持续不断地对低人权优势予以批判，既反映了他的与时俱进，也使他的批判散在浩如烟海的各种文献之中，有被淹没之虑。这些文献终于由他本人汇集到上、下两卷之中，在允许言无不尽的美国出版，可省去读者和研究者为追踪这些散在各处的论文而不得不花的时间和精力，因而值得特别庆贺。

在中国的语境中，官方和接近官方的学者实际上将这一“优势”视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个出奇制胜，弯道超车的杀手锏。为此，官方不惜坚持歧视农村人口、农民工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诸多制度，以便维持基于低人权的所谓竞争优势。在看懂了官方意图的学者中，若无足够勇气，是不敢发声批判的。秦晖目睹低人权成为不臭反香的东西，招摇过市，知道长此以往

必对民主事业造成巨大危害，因而挺身而出，公开予以鞭笞。如此的胆识、文笔和口才，在大陆的学者中是千里挑一的。

得益于秦晖的多产和雄辩，他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在民间引起广泛共鸣。只是，共鸣虽然广泛，但多止于道德和伦理层面。由《秦书》可以看出，秦晖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远远超越道德和伦理层面。只是，当涉及更为复杂而敏感层面时，内中的道理不易为一般人透彻理解，因而曲高和寡。同时，低人权优势带来的弊病有个发展和显露过程。所以，对低人权优势的批判并非能一蹴而就。时至今日，按《秦书》的说法，人类已经面临四大危机，即经济社会危机，政治机制危机，国际关系危机和思想认识危机，可见长期忽视低人权优势之危害。

以下是本文的结构：第一部分将评述秦晖的重大学术贡献之一，在于识别出实现低人权优势的必要条件；第二部分指出，高人权实体应该引为教训的单边开放，在自废武功的同时，却未能促进低人权实体的市场化改革；第三部分讨论为何重回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老路不切实际；第四部分讨论今后征收关税的目的，应旨在消解非市场行为带来的价格扭曲；最后是本文的小结。

一、秦晖的贡献—识别低人权实体实现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用东德瓦解前的独裁者昂纳克（Erich Honecker）命名的寓言警告世人，是秦晖的首创。他证明，如果在推动经济一体化之前，不先以较高的（西德）人权标准为准绳实现两德人权标准的一体化，西德迟早会被迫面临三种选择，均对自己不利：1）在一段时期之后，不得不重新建立两国间的隔离

墙，以减缓乃至终止经济一体化进程；2）使自身的人权标准向东德靠拢，因而改变自身的经济-政治体制；3）自身经济因经济一体化的持续推行而崩溃。昂纳克寓言给出这三种结局，旨在警示人类，历史并不一定终结于福山所言的民主宪政和自由市场体制。如果忽视人权一体化这一必要前提，专制、独裁体制可以借助经济一体化，使民主潮流发生全球性的逆转。

对昂纳克寓言能否应验，许多人在当时是心存侥幸的。即便是秦晖自己，也曾希望这个寓言只是一个“笑话”而已。²当年东、西德之间的演变确实未出现昂纳克寓言所预言的惊悚结局，使人们一度对世界的未来走势多了一份乐观。在民主化潮流遇阻甚至逆转、全球化大幅倒退已成现实的今天，人们不禁会有世事不幸被秦晖言中的感慨和敬佩。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低人权优势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实力连续超越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直逼美国，成为最引人瞩目的世界性大事件。一度走上宪政民主轨道的俄国，不但重返专制轨道，而且三年前悍然武装入侵乌克兰这一民主国家，至今拒不撤军，拒不停战。归根结底，俄国也是自恃拥有低人权优势，能将大批本国青年作为炮灰投入战争，不用像高人权实体那样顾忌民意的反弹。

如果让上述低人权优势在经济和军事层面上持续下去，那昂纳克寓言不是将在世界范围内应验了吗？因此，以下两个问题对不但在思辨上富有挑战性而引人入胜，而且因探讨结果涉及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而极具必要性和紧迫性：1）探讨这一寓言获得应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以及2）如何有效化解这一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第一个问题已被秦晖解决；第二个问题却未见秦晖有明确的答案，笔者愿借助此文与秦晖商榷。

为了有助于讨论，有必要重温一些定义。1) 众所周知，人权的定义不但涉及人性尊严的基本权利（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等），而且包括财权（个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利）。2) 民主和人权两者互为基础，互相促进，因而互为因果。3) 秦晖对低人权优势所作的定义如下：“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见《秦书》自序）。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低人权实体要实现竞争优势，1) 需要出现秦晖强调的，将人权、财权、政治权等等都暂时置于不顾，单维地推动经济一体化这一前提条件；2) 其实还需要能够持续地压低人权水平的制度安排这一必要条件。这一必要条件并未为秦晖明确强调，而在以下的讨论中将被重点提起。所谓制度安排，不但表现为将劳动的收入人为压低（例如，在中国现行的户籍和土地制度下，农民工的所得无以满足在打工地完成人口再生产的需要），还表现为不准土地私有，使私人产权失去依存之根据，其他产权也因此遭到强制性地剥夺、侵占、操控，致使生产要素的价格遭到人为扭曲。由此可见，不但农民和普通民众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民营企业家都常常难逃各种厄运。

需要说明的是，低劳动成本并不等价于低人权。劳动成本除了取决于人权的高低，还取决于劳动的供应。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因而长期抵达不了刘易斯的第二拐点，甚至抵达不了第一拐点，即使有高的人权标准，只要由市场决定性地配置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工人的工资就不可能高，例如实行民主政体的印度。

秦晖的贡献在于明确指出，只要存在经济一体化被单维度地在全球推行这

一必要条件，低人权实体就能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也即迟早战胜高人权实体。这是秦晖的昂纳克寓言的最主要的警世之处。理由如下：面对低人权实体的存在，高人权实体主动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则高人权实体中的资本和技术就不用顾及低人权实体的人权记录，出于逐利本性，会合法地流出高人权实体，使之产业空心化，同时源源不绝地流向低人权实体，使之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直至超越高人权实体。

东、西德之间之所以没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结局，其实是因为发生了很幸运的事。在经济一体化发生之前，上面提到的第二条必要条件竟在汹涌的苏东波浪潮冲击下，因东德独裁政权的突然瓦解而自行消失。东德民众自愿接受了西德的宪法框架。如此一来，东德原有的低人权优势迅速失效。东、西德之间随后发生的经济一体化，便无法损害西德所存在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实力了。

二、教训：高人权实体的单边开放等于自废武功

南韩，台湾，智利等低人权实体在民众收入提高后，确实和平地完成了向高人权实体的转型。所以，人均收入的提高使低人权实体向高人权实体转变的可能性，不但得到理论的支持，也有了实证的支撑。如果算上南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 1990 年代的东欧和前苏联，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关于历史已经终结、并终结于宪政民主的乐观情绪，并非完全空穴来风。

WTO 在 2001 年接纳中国为会员，重要原因是被中国拥抱世界的决心所感动。当时的中国，东西南北都响彻着要与世界接轨的宣誓声。同时，中国

的巨大市场散发着不可阻挡的诱惑。发达国家克服心中的重重疑虑，愿意相信中国一回，同意首先单边开放市场，换取中国用 15 年的时间，将自己改革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15 年后，中国倒是成长为一个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经济体。令人惊愕的是，中国不是据此增大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信心，反而推出反市场导向的中国模式，以经济的飞跃发展作为这种模式具有优越性的证据，坚信世界已经出现百年未遇的东升西降大变局，决心根据举国体制下的党国需要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通过弯道超车，不失时机地以最快的速度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皇冠。至此，欧美日发达国家才发觉上当，中国已决心以这种在本质上与市场机制和民主体制不相洽的中国模式引领世界，争夺对国际格局的主导权。

可是，2001 年这些国家已经将自己的市场立即、单边、全面地向中国开放，等于丢了杀手锏。面对几乎不再设防的欧美日市场，在 WTO 所给的 15 年宽限期中，中国再也没有推出诸如 1980 年代解散几乎所有的人民公社，1990 年代私有化几乎所有的国营企业这样全局性的改革措施。这两大措施深刻改变了城乡全体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高度机会主义的中国当局，眼见高人权实体国门洞开，立刻抓住千载难逢的重商主义良机。在随之而来的滚滚贸易顺差面前，举国上下哪里还有动力去作艰苦的市场化改革？

在 WTO 给予的整个 15 年宽限期中，中国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 2013 年推出的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³ 在这份《决定》中，中共自己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

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这是中共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经济改革的终极目标所作的，最接近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一次表述，涉及到了资源配置机制这一所有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可是，这份《决定》出笼之时，WTO 给予中国的 15 年宽限期已经接近结束。而且，这份《决定》本来就姗姗来迟，又在几乎公布的同时，成了一份废纸。犹如儿戏一般，习近平宣读《决定》的话声未落，中共便在他的一声号令下，急剧地向党国体制回归。

不过，就在东方的秦晖用昂纳克寓言警示世界警惕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的几乎同时，在西方的哈佛大学，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在 2011 年出版的《全球化的悖论》一书中，也提出“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形定理”（Trilemma of Globalization），即一国政府在追求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以及民主治理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冲突。所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智者对激进全球化予以当头棒喝。高人权实体在事实面前，终于认识到，单维地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好为低人权实体得以实现其竞争优势提供了必要条件。目前，高人权实体为防被绑架，已停止单边推动经济全球化。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结论，WTO 起码犯了双重错误：1) 过速、过松地吸纳新成员国；2) 过快要老成员国开放市场。这两项错误使 WTO 不像 GATT 那样，由市场经济体制实体组成，却成了一个鱼龙混杂的贸易组织。因此，不但无法像当年的 GATT 那样顺利消化具有国家主义和重商主义倾向的德国和日本那样消化中国，反而给自己找来一场世纪鏖战。如果历史

能够再来一次的话，WTO 应该提高新会员的加入门槛，按照对等原则，只有确认新会员的市场机制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贸易壁垒在逐步减少之后，而不是之前，老成员国才能对等地、逐步地开放自己的市场，以避免上述错误。

三、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老路为何不切实际？

吸取教训后的今天，高人权实体已不再坚持推动单维的经济全球一体化，因而使上文提到的，昂纳克寓言要应验必须具备的第一条必要条件不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昂纳克寓言还能应验吗？笔者认为仍有可能，理由如下。秦晖所识别的低人权实体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的前提条件，即单维地推动经济一体化，其实是低人权实体能在竞争中获胜的强条件。低人权实体可以退而求其次，只需贸易自由化这一弱条件，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下，高人权实体的经济一时无法摆脱对低人权实体的供应链的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允许自由贸易，低人权实体仍能实现自己的竞争优势。

读者会问，二次大战后，高人权实体一直在提倡自由贸易，为何没有出现昂纳克寓言的结局呢？这是因为当时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双方很少经济往来。高人权实体被迫只在自己内部搞自由贸易，反而使 GATT 因成员国在经济体制上的同类而获得极大成功。因此，上世纪 80 年代起，高人权实体考虑将 GATT 升级为 WTO 时，并无将社会主义阵营也包括进来的奢想。当中国对 GATT 的升级版感兴趣时，GATT 成员国对中国经济体制的高度异质性是极度戒备的。

可是，今日的形势已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由于轻信经济一体化口号，高人权实体单方面实行了大门洞开的政策，主动将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量外移。作为主要的低人权实体的中国，却没有相信这个口号。中国一方面把取代英美，成为全球化新旗手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所作所为却严重违背全球化的主要原则，即各国根据比较优势组织分工合作。中国处处设防，处处留了后手，一边在关键部门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边悄悄建成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最完整的供应链。

在全球化时代，一国能出现这种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供应链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最大讽刺，对比较优势原则的严重违反。中国利用党国体制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不管有没有比较优势，不惜代价地予以扶植国营企业。同时，中国利用高人权实体的不设防，向高人权实体的商业、产业、教育和科研作了全面渗透，攻占世界市场和科技的前沿阵地，企图击败靠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高人权实体。

所以，这场世纪鏖战的难度在于：1) 高人权实体的产业已经空洞化，无法构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供应链也变得残缺不全，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像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实体。2) 中国不但拥有了最完整的制造业和供应链，而且在需要时，可以用最低廉的价格向世界倾销（例如钢铁、电动汽车、光伏产品等），或用最严厉的措施对其他国家予以封锁（例如稀土产品和锂电池等）。而且，中国的生产要素是由党进行决定性的配置的，而不是至今没有发育完善的要素市场。所以，要素价格严重扭曲。众所周知，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可分解为要素价格的组合。只要要素价格扭曲，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存在扭曲。

高人权实体面对严重扭曲的中国的价格形成机制，纷纷否认中国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对让中国继续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说易行难，真要从书面声明落实到贸易和经济的限制措施，必定遇到中国的强烈抵制和凶猛报复，因为中国的党国体制最善于用战斗的姿态对付各国。在排除了与中国在经济上彻底脱钩，以减少自身的伤害后，人们想起 1990 年代早期美国国会使用过的武器，即将人权记录和最惠国待遇挂钩。既然维持低人权的制度安排是昂纳克寓言应验的第二条必要条件，使这一条件失效，能否化解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呢？

如果检视美国国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记录相联系的实际效果，就会发现，挂钩的效果并不理想。首先，人权记录的收集是否完整、评估标准的确立是否客观、选择和培训评估人员是否公正、评估报告的撰写和散发是否有效，对评估的结果有极大的影响。为了使评估结果尽可能完善而客观，需要庞大的资金，除了用以维持评估人员的生计，还要使他们拥有及时抵达现场的交通工具，还要保护那些作证的人员免除后顾之忧等。对人口众多、幅员广大、信息不透明、评估人和接受采访者容易受到当局报复的低人权实体来说，除了所需资金变得不胜负担外，收集和评估人权记录这项工作也会变得冗长而危险，评估结果是否全面而公正，更常常引起无谓的争议。

而且，低人权实体很快学会如何操控评估效果，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它们会无故关押已经获得国际声誉的人权活动家，又赶在国会即将讨论人权记录时，将他们高调释放，送至国外，利用暂时的国际轰动效应彰显自己从善如流，人权记录大有改进。欧美日政府为了显示自己的人权政策有效，也会默认低人权实体的这种“示好”和“做戏”，以便对本国纳税人

有所交代。当然，对人权斗士和活动家的勇气应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于他们获得解救也应予以庆贺。只是，少数人的解救毕竟不等于人权的普遍改进。正是后者，才能根本扭转低人权实体的优势。

可见，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在操作中的整体效果十分有限。而且，仅仅根据人权记录，决定给不给最惠国待遇，相当于在零与一之间博弈，对两国的经济交往带来极大的冲击。在两国的经济交往十分有限的1990年代初，这种挂钩也许可行。在高人权实体实行大门洞开政策二十多年之后，美中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已经如此之高，各类中国企业早已名正言顺地进入高人权实体的各个部门，与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行业、集团形成了利益共生体。并不是所有的利益共同体都涉及军工和国家安全，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予以全面禁止。高人权实体都是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民主政体，经济的稳定和民生的改善会影响选票。所以，对利益共生体针对最惠国待遇发出的呼吁或抗议，民主政府不能一概漠然处之。

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挂钩，理由是相当勉强的。回顾实施挂钩政策的1990年代就会发现，很快，其他盟国不愿追随挂钩政策，最后只剩美国独自一国在坚持挂钩政策。即使在美国国会，每次审议中共人权记录，以便决定是否继续给予最惠国待遇时，最后都是同意给予的一派占了上风。这种投票结果并不反映中国的人权记录在改善，更多地反映出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会对本国经济伤害更甚的担忧。

根据WTO的规定，一旦某国成为WTO成员国，便自动享有任何一个成员国给予其他成员国的待遇。其中，含金量最高的，就是美国给予其他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美国不但市场容量世界第一，而且关税最低、贸易障

碍最少、人员和资源流动最为自由，对外国投资最为开放，科技又发达。中国之所以对 WTO 的成员国身份志在必得，也在于一旦获得，美国就无法再用国会审议人权记录的手段，阻碍中国获得这一世界上最为重要的最惠国待遇。所以，在中国已经成为 WTO 成员国后，再谈最惠国待遇，已经为时已晚。

四、关税虽非万能，却不应轻言废用

以上讨论旨在表明，高人权实体既无法与中国经济完全脱钩，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重新挂钩也已时过境迁。至于借助战争手段解决贸易纠纷更匪夷所思。所以，高人权实体究竟如何应对一个经济实力已经直逼，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却又坚持非市场体制的低人权实体呢？自从高人权实体否定中共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并反对继续给予中国以市场经济待遇，已过去将近 10 年了。尽管人们在急不可待地寻找有效对策，以便消解低人权实体的竞争优势，笔者并未见到秦晖有具体的建议，倒是见到秦晖严厉批判关税万能论。关税万能论自然是错的，因为没有何物是万能的。但反对关税万能论，不等于关税作为一个工具就真的一无是处。

秦晖在讨论世界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时十分悲观，也是笔者难以苟同的。他认为，“20 多年全球化的结果出人意料！全球性制度碰撞的‘新冷战’其实早就存在，只是它比旧冷战更‘冷’，也更‘战’。而由于西方的‘自由贸易’派和‘关税壁垒’派，都长期无视这种挑战，西方事实上已经在这种‘新冷战’中失败。”（见《秦书》“自序”）我觉得秦晖言重了，其实不必如此悲观。正像历史没有像福山推演的那般直线前行一样，东方大国虽然拥有低人权优势，但是，由于以下原因，它无法保证今后能沿着昂纳克寓言所警示的

路径继续高歌猛进。

笔者认为，低人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经济能够高速发展的全部原因。客观地说，中国经济的一度高速增长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国内和国外因素。例如，即使市场化改革只部分完成，已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资源配置优化。上文提到，1980年代用分田单干代替人民公社这种农奴制，以及1990年代将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使城乡本来沉睡的巨量土地、资产和劳动力得到更有效的利用。由于中国拒绝将市场化的改革进行到底，今后，资源配置优化这一因素已无法再起作用。再以国际因素为例，高人权实体在市场、教育、科技、资金、贸易等领域向中国全面开放的态势已成昨日黄花，迅速被“小院高墙”和各种关税和投资壁垒替代。正因为国内外的美景不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快速走低，由一度的百分之十几降到近年来的百分之几了。这段时期，中国的低人权状况其实未见有显著变化，因而无法用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何断崖式地下降。

令人深思的是，上文指出，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直接挂钩，对人权的改善效果极为有限。意想不到的是，伴随着资源配置的部分市场化，不但配置效率得到极大的优化，人权也获得显著而普遍地改善。例如，随着全体农奴变成了半农奴，他们获得了排他性的土地使用权，对自己的产品有了占有权，有权进城打工，因而人身依附性显著减少。又如，本来工人犹如被国家完全支配的工奴，终生被绑定在国家或集体的某个“单位”之中，生杀大权被掌握在单位的领导手中，完全没有择业自由，更无自行创业的权利。可是，1990年的城市地区以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改革，使这些工奴们有了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谋求工作的选择自由、创业自由、以及迁徙自由。这些自由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我们可以说，城市居民的人

权和农民一样，也得到了普遍的改善，尽管离开理想状态仍有遥远的距离。

这说明，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和人权、和民主宪政是相洽的。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对人权的改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并惠及所有人。由此可见，尽管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挂钩，旨在直接改进人权的努力受到了挫折，但市场化的结果，却使中国本来长期存在的农奴制和工奴制遭到瓦解。无论是农村人口还是城市人口，他们的人权获得重要而显著的改善。这种人权的改善，是市场化带来的，受益者是每一位农民和工人，而并非被救到海外的少数幸运者。

之所以说今日的农民仍是半农奴，是因为他们仍处于强制性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下，无权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无权携带土地退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无权自由买卖土地来改变自己的生产规模，无权组织农会，无权迁移到打工地定居，组织家庭，完成在打工地的人口再生产，使子女融入到打工地所在的城市，纳入城市的福利体系中，成为真正的市民。因而，他们仍是半农奴。即使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工人，他们仍没有罢工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更没有组织政党、自由选举的权利。这样的工人也只能称为半工奴。可见，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权仍有普遍改善的巨大空间。

笔者认为，不应一般性地否认关税的作用。对于美国这样的高人权实体来说，为了使自己征收的关税师出有名，应更具针对性。关税可以是：1) 针对低人权实体中，因借助非市场机制决定性配置要素而引起的价格扭曲部分，而非单纯地针对因过剩劳动力的存在而引起的低工资。后者正是不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作这种区别，才能使关税的征收符合市场经济的原

则，又不会扰乱比较优势的正常发挥。2) 关税可以是针对非市场经济体制的，因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关税。3) 关税可以是针对知识产权的盗窃，因而对含有盗窃来的技术的产品可以征收知识产权盗窃税。以上只是随手举的例子。由于关税的税种和税率可以层出不穷，可以灵活多变，因而关税战可说是方兴未艾。而且，征收关税的目的不仅在于保护高人权实体本国的产业和就业，也是为了最终使非市场经济体制能向市场经济体转化。它们转化得越快，越能面对较低，甚至为零的关税。

五、小结

秦晖的昂纳克寓言及其背后的逻辑发人深省。他的学术贡献之一，在于鉴定出了使昂纳克寓言应验的一个必要条件，即单维地推行经济一体化，成了低人权实体得以实现低人权竞争优势。不过，人权如此重要，欧美日发达国家却没有重新回到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的做法上去，而是转向“小院高墙”和关税，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笔者对川普的关税政策并不完全同意，但并不全盘否定，因而认为秦晖对关税的功能太过悲观。如果高人权实体在对低人权实体征收关税时，更有针对性，例如针对低人权实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偏离程度，针对价格的扭曲程度，针对知识产权遭到盗窃的程度等，则关税的征收既能保留市场配置，保留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又能迫使低人权实体向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演进。本文并且论证了，用关税迫使低人权实体向市场化演进，其实可以显著促进人权的改进，从而间接地使低人权实体自称的世上最全的、其实是高度扭曲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得到纠正。

注释

- 1 第三波民主潮指苏联东欧的“剧变”后，自由民主体制对这些国家原有的各种专制体制的胜利，并带动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进程。于是，自由民主的支持者信心满满，以至于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提出，乐观地认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较量，已经决定性地分出了胜负。
- 2 秦晖的原话是：“当时听到的德国人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反事实的笑话’（因为事实是西德与东德先实现了‘人权一体化’，然后才有的经济一体化），但是我说：在昂纳克时代的德国，这确实只是一个‘寓言’，但在今后的世界上呢？……我多么希望今天这也只是一个寓言啊！”见《秦书》的自序。
- 3 摘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公报、说明（全文）。见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311/18/t20131118_1767104.shtml



黄奕信画作